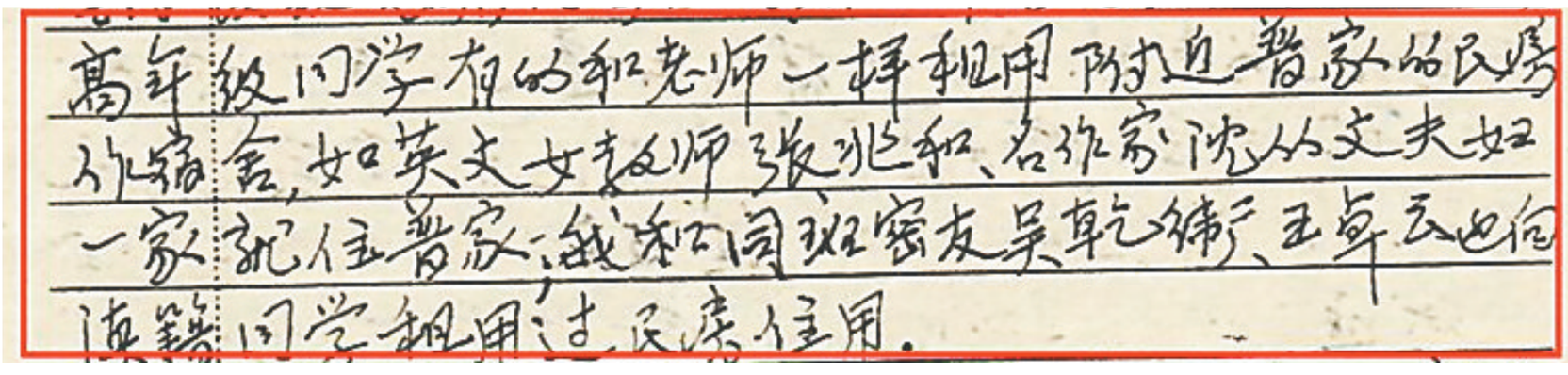
学林一叶


高年级同学有的和老师一样租用附近普家的民房作宿舍，如英文女教师张兆和、名作家沈从文夫妇一家就住普家，我和同班密友吴乾纬、王卓云也向该籍同学租用过民房住用。

校友许洪回忆沈从文夫妇的手稿（部分）。

沈从文夫妇与育侨中学

【编者按】我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沈从文先生（1902—1988）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与妻子张兆和在“育侨中学”任教。“育侨中学”是海南华侨中学的前身之一，今年是华侨中学迁琼80周年，这段往事又被重新提起。

■ 杨本科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吞灭中国。1939年5月，泰国的华文学校陆续停办，是年秋季，曼谷较有名望的黄魂初级中学、中华学校、新民学校等三所华文学校的700多名学生遭受失学之苦。

时任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先生随即就此事与中华学校校长许葛汀、黄魂初级中学校长张亦铮、新民学校校长纪宏良磋商，又电告在昆明经济部商品检验局任技士的王毅洽商在昆明办一所招收侨生之学校。该局蔡无忌局长（蔡元培长子）得知此事后深表同情，批准王毅每日半天假期以协助筹办侨校事宜。王毅即向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陈述此事，龙表示支持，并指令其秘书协助觅校址及办理注册事宜。最终决定在云南昆明借用原昆华小学校舍创办“暹罗联立育侨中学”，后来改名为“私立育侨中学”（以下简称“育侨中学”）。

1938年，沈从文随筹备组在昆明稳定下来之后，迫切希望妻子和孩子到自己身边，于是写信给张兆和。半年间，张兆和犹豫不定，沈从文无计可施，便写信给他尚未有阅读能力的儿子沈龙朱。

1938年11月，张兆和带着沈龙朱、沈虎雏取道香港、越南，抵达昆明。由于孩子太小，张兆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庭上。根据沈虎雏等人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沈从文一家住在昆明呈贡县龙街149号杨家大院。

学校于1939年12月5日正式开学，1940年10月因日机轰炸昆明，学校迁至昆明市呈贡县龙翔寺继续办学。当时教师多聘自西南联大，著名教育家、时任西南联合大学训导长查良钊任校董，教员素质较高。

据校友许洪后来回忆：训育主任董凌云是老清华的，教务主任黄季方、早期教中文的司徒堂、初三班主任黄葆先、高一班主任陈克刚（志让）、教高二英语的李惟存……都是西南联大到育中来授课的——当时联大同学外出兼课，以三四十圆国币的月薪略补开支是很普遍的事。由于这种特殊关系，有人甚至戏称西南联大与育侨中学是“兄弟院校”，联大众多校友确实在育中留下了很动人的篇页。

1940年10月，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育侨中学迁至龙翔寺继续办学，一批华侨男生住进杨家大院的前楼，成为沈家邻居。

1940年夏，张兆和应校长卢蔚民的邀请进入育侨中学担任英文教师，并在育侨中学与国立华侨中学合并后工作至1943年初。《与二哥书：一个叫三三的女子》一书所收的《张兆和年表》记录：“1940年夏—1942年春华侨中学（呈贡龙街子）任英文老师。”这里的“华侨中学”即“育侨中学”，因私立育侨中学1942年初并入国立第一华侨中学，改称国立第一华侨中学呈贡分校。妻子在这里工作，沈从文偶尔也来客串一下，次子沈虎雏回忆道：“爸爸每星期上完西南联大的课，下乡日子也去龙翔寺讲两堂义务课，家里因此常有年轻华侨朋友来玩。每逢育侨中学开同乐会，全家都去捧场。”

沈从文后来回忆起华侨学生时说：“抗战时期，我和我家中人住在云南滇池边呈贡县一个叫作‘龙街子’的小村里。那里有个华侨中学，是因为避敌机空袭，从城里迁到乡下的，共有三百多华侨男女同学，分住在两个小庙中。应校长的邀请，我也在那里尽义务教点作文。”（《忆呈贡与华侨同学》）

华侨中学的学生都能歌善舞，给沈从文次子沈虎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庙堂里木板搭的简陋舞台上，曾强鹏同学独奏小提琴，跺脚打拍子，扬起阵阵灰尘，有人边弹吉他边用外国话唱南洋歌，另一位用琴弓在弯曲的锯片上来回蹭，居然能对付着演奏乐曲，几个男女同学表演奇特的夏威夷草裙舞，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演出让我确信：华侨人人多才多艺。”

1942年，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奉命开进缅甸与英美盟军并肩对日作战。他听说华侨中学的学生都是从东南亚地区回国求学的，征得卢蔚民校长的同意后，由政工上校团长到校号召有意加入抗日行列的同学到军中担任翻译。当时远征军的主要目标是经缅甸向占领泰国的日军反攻。刚从泰国回来的侨生，就充当小语种翻译，帮了大忙。据《沈从文年表简编》记载：

因远征军准备第二次入缅甸作战，许多华侨男生被动员入伍作译员，呈贡县龙街的育侨中学停办，张兆和暂时失业。

1942年7月20日桂林《大公报》刊登了张兆和的文章《思想·信仰·工作——赠育侨随军同学》，她在文中动情地教育学生要明白“我们这个民族正在苦难中”，并寄语学生“要得救，必奋斗。‘为人类而工作’，应当是我们学校每个离校同学都记住的一句话”。

为了鼓励从军学生，沈从文特地创作了一首歌曲，可惜只在沈虎雏的回忆中留下只言片语：“我们都是好青年，勇敢……”育侨中学学生敢于杀敌，奋勇向前，从军同学为国捐躯比例远超西南联大。马君豪校友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小说《野人山余生》，在热带雨林中，这些年纪轻轻的学生既要和敌人作战，又要和毒蛇、蚂蟥、饥饿作斗争：“我们庆幸找到一个避雨的地方，是一座精心盖起来的草棚。然而，才过了几个钟头而已，一阵腐烂的尸臭慢慢向我们袭来。一共是二具尸体，无遮无盖的（地）躺在棚中的一个角落里。这时，我才想起为什么这座草棚盖得如此齐整的原因，一定是死者的同伴临走之前，希望让他们还保存一线生还的希望，才盖得坚牢些，而且尸体的旁边，还放置不少食物和清水呢。”

诗人穆旦几年后回忆起在热带森林里艰苦的生活，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在诗中他这样写道——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第一华侨中学呈贡分校及保山第一华侨中学参加入缅中国远征军之同学共二十五人，被分派200师八人，38师八人，22师九人，其中十人为国殉难。现在已知姓名的有陈宁威、兰茂盛、黄根好、李振兴、陈时中、杨锡基、罗声渺、马君豪、潘侨南等九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曾跟华侨学生约定在北京见面，希望他们有机会组织个二三十人的观光团来京城：“看看北京的花，看祖国一切新建设，看看生活在当前的年青一代，由于国家好了，社会本质变了，亿万人民的劳力和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都用出来了。只要能回来看看，一定会深刻鼓舞同学们更加热爱祖国，而且知道此后应当如何来为国家为更年青一代多作点事情！”（《忆呈贡与华侨同学》）

（作者系海南华侨中学教师、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沈从文一家在育侨中学的合影。 本文图片均由海南侨中校史馆提供

节令物语

古代立春习俗

悄悄地，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今年2月4日便是立春日。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自古备受重视，其起源可追溯至周朝，天子率臣于都城东郊举行迎春大典。东汉后，“迎春”礼俗渐盛，如妇女“剪彩为燕”为饰。唐宋至明清，迎春、鞭春等仪式日益隆重，成为重要的官方与民间节日。

“立春”又称“打春”，位于“六九”之初，故有“春打六九头”之说。

古时民间还有“咬春”的习俗，人们在立春日食用特定的食物来迎接春天。北方流行吃生萝卜，取其清脆爽口、寓意咬去春困与寒气；南方则更盛行吃春卷，用薄面皮包裹时令蔬菜、肉丝等馅料油炸，寓意迎春纳福。

古人认为立春时节阴阳交替，气场变化，容易影响人的情绪与运势，因此有“躲春”的习俗，往往在这一天避免外出串门、探望病人或参加丧事，保持心境平和，以顺应自然节律，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此外，古人还有在门口燃放樟树枝（“燂春”）的立春习俗，以驱虫避秽。踏青等户外活动，则寄托了先人们对新年安康、生机勃发的美好愿景。

有关立春的习俗，在古代诗词中也有一些记载，而且文字表达更加生动、有画面感，特别是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

立春日鞭打土制春牛，是劝勉农耕、祈愿丰收的重要仪式。苏轼在《减字木兰花·立春》中就写道：“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这是他在海南创作的词句，展现了当地立春时节早至的绚丽春光。词中一连七用“春”字，如春天的奏鸣曲。苏轼还观察到当地“春杖打春牛”“剪春幡春胜”等风俗与中原相近，体现了立春习俗的广泛流传与文化共性。苏轼的作品在描绘习俗与春光时，也透露出其被贬为“琼州别驾”，在“昌化军安置”后随遇而安、乐观豁达的心境。

簪春幡和挂春胜也是立春习俗之一。春幡与春胜是用彩绸或金箔剪成的小旗或饰物，立春时佩戴于头上或悬挂于树梢，作为春天的标志。辛弃疾在《汉宫春·立春日》开篇即捕捉此景：“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此外，苏轼的词中也提到“春幡春胜”，这些饰物使立春时节更显灵动和富有诗情画意。

宋时，人们还为立春日准备春盘和春酒的习俗。辛弃疾的词中提到“黄柑荐酒”与“青韭堆盘”，即用黄柑酿作的酒和春日韭菜堆叠的春盘来祭祀迎接新春，反映了南宋时期立春饮食习俗的一部分。

（陈耿 整理）

文博苑

琼北民间藏珍 古瓷溯源内地

■ 陈桦 高杨

历史上，多次成规模的内地人口迁入海南，深刻塑造了琼北地区的文化面貌，文化习俗的同源性与本土化，使得许多文化遗存与内地有着清晰的同源关系，仅是日用陶瓷层面，历代名窑名瓷在琼北乡下，至今并不少见。在海南民俗博物馆“岛外民间流入文物”板块，就有一套南宋湖田窑影青重层菊瓣高足扣银盏、托，一对元代枢府釉狮耳炉，两只康雍乾三代仿宋哥窑将军罐（一缺盖），它们与海南本土历代陶瓷系列一起，静静地接受访客的观赏。

南宋重层菊瓣高足扣银盏
银缮镶边更显沧桑之美

前些年春节，笔者在山西太原古玩城看到一款影青花口高足老盏，盏内底及喇叭足墙积釉处青绿色泛出明显，没太犹豫便买下。该盏后来经海口古玩城陶瓷鉴赏专家张国明先生鉴定，被命名为：南宋景德镇湖田窑影青重层菊瓣喇叭口高足花口扣银盏。名字长是长了点，却将年代、产地、釉色、形制等要素交代得颇为全面。

年深月久，器物流转，该盏的口沿已呈现小磕小冲，原主人应请过银缮高手修复。可以想见匠人曾细细锤揲、剪裁银箔，精心扣包口沿，湖绿、银白的镶边，美轮美奂，不亚于原器之美。数百年过去，银镶边被侵蚀、风化，笔者作为接手的新主人，干脆拆除部分，保留下粘连较紧的银垢，这并不影响它的观赏价值，反倒彰显它历经岁月的沧桑之美。

近期，笔者整理家中旧藏时，翻出一件南宋湖田窑花口（盏）托，是海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涂高潮先生早年从海口乡下觅得、赠送的。灵光乍现，拿来那只“盏”，试着搁到“托”上，不想盏托配套，接口天衣无缝。原来，它们就是一个年代、一个窑口、一个瓷种、一个器形、一个规格的器物，或许它们本是一套茶具，却盏托分离，后又破镜重圆；又或许它们虽非原配，但同类同规格的“残”器却珠联璧合，又实为幸事一桩。

经测量，花口盏口径11.4厘米、高6.8厘米、底径4厘米；花口托口径13.5厘米、高4.3厘米、底径13.5厘米。

南宋重层菊瓣高足扣银盏及（托）。海南民俗博物馆藏

元代枢府釉狮耳炉
灵润如玉泛湖蓝

8年前，从海口市龙桥镇吴西村一位村民承让到一件狮耳炉，笔者仔细研究过它的形态、瓷胎、釉色，越看越喜爱。

几年后，我们在重庆的一家古玩城里与它的同类不期而遇。两只狮耳炉的胎质白而润泽，釉汁匀净细腻，状如凝乳，色似鹅卵，灵润若玉，积釉处泛湖蓝色。足底平切，外底不施釉，足外底中心乳钉状突起。因在匣钵底部垫砂仰烧，其圈足边沿有少量粘砂，口沿有小磕，于是果断买下了它。

回到海口比对二者之后，发现它们工艺相同，大小一致——口径12.3厘米、底径8.7厘米、高6.9厘米。

经海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钊鉴定，它们为元代枢府釉狮耳炉。“枢府釉”是人们对元代卵白釉官窑瓷的别称，是景德镇为枢密院等官府机构烧制的卵白釉瓷器，因釉色白中泛青、质感似鹅卵而得名。

清代仿宋哥窑小将军罐
造型、釉色略胜原窑

湘北津市毛里湖是湖南第二大湖泊、国家级湿地公园，周边遍布古遗址、古墓葬。毛里湖镇20多年前就有4个古玩店铺，机缘巧合，笔者曾在亲友帮助下买下一批古旧物件，其中就有清代康雍乾仿宋哥窑小将军罐。

康雍乾三帝均喜欢宋代五大名窑，雍正还曾专派督陶官唐英坐镇景德镇，特建“仿古作”，照宫中古瓷仿制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的作品，仿瓷胎土更细腻、坚硬，造型、釉色甚至略胜一筹。

此罐高21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11.5厘米，直口溜肩鼓腹收腰撇足，线条优美，器型规整，紫口铁足，金丝银线灿然，内外米黄釉水肥厚莹润，既真又精且新，无愧无款之官窑。

清代仿宋哥窑小将军罐。海南民俗博物馆藏

元代枢府釉狮耳炉。海南民俗博物馆藏

2019年3月12日，海南民俗博物馆原馆长高永南与朋友踏访海口市永兴镇玉安村时，不经意间在一陈姓村民的老宅里，发现闲置的一件祖传康雍乾三代仿哥窑釉罐，年代、窑口、瓷种、规格与来自湖南的那只完全一致，而且还带有盖子，罐加盖通高27厘米，是典型的将军罐制式。而湖南的那只，原主人已经弄丢了，笔者购入时并不知晓，因为口沿上釉的器物大多无盖，湖南那件的口沿便是上釉的。由于它相对于标准的将军罐，规格稍小，因此被称作小将军罐。当时，应高先生的请求，陈先生惠让了那件小将军罐。

文史荟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